

清末民初西方文论话语输入对重建中国文论的镜鉴

李 凯 张蕊吟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这种文化病态的形成则是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结果。承认“失语”虽然令人沮丧,但重要的是如何恢复和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初西方文论引入的根源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代表倡导的引入原则、立场、方法等进行回顾与反思,重估清末民初“西语”的输入及其影响,为重拾文化自信、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寻求可资借鉴的动力和资源。

关键词: 中国文论 失语症 重建 文化自信 学术独立

涿本采无

DOI:10.13760/b.cnki.csalt.2019.0082

自曹顺庆先生在《21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首次提出中国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以来,“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一直成为迄今为止的学界所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曹顺庆先生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这种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甚至可能是极为剧烈冲撞)的结果。”^① 中西文论话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猛烈碰撞,始于清末民初西方话语的大量输入。因此,重新回顾清末民初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历程及原因,分析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先觉之士对西方话语引入立场、方法、原则等的

①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 期。

认识,不仅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还可以为疗治“文论失语症”,特别是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提供历史镜鉴和正确方向。

一、清末民初西方文论的输入及根源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西方话语的输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层次的转变,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范式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文论的近现代转型就是在这种西方文论话语大量输入的背景下展开的。西学的输入最早可追溯到明清之际,“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适当明清之际,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①。此时段所输入的西学尚停留在器物、天文、演算等技艺层面,且接受者也仅为皇帝、贵族等上流层次,未与中国文化产生实际意义上的交流与对话。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西文化才第一次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有志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②,开始无拣择地输入外国学说,西方文论话语体系正式开启西学东渐的引入历程。

追溯清末民初西方文论话语输入之根源,大致可归结为两个主要维度,即外界政治环境的客观因素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学者的盲从心态、中国文学及文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外在客观维度来说,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与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引入具有直接的关联。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教会之后,中西文化之间断绝往来已有一百多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于时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重臣因震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有了“西学”“洋务”的提倡。“西学”作为一个名词,也是对耶稣教会所创始名词的沿用。而此时段所引入的西学与明末清初所引入的内容大体相近,主要以天文、测算、地图等科学实用技艺为主。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就曾概括道:“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③ 故此时段与明清之际同可归为西学引入的第一阶段。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特别是中日海战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救亡路线的失败。接二连三的几场飓风使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③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根本的震动。随着民族危难的加剧,以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为代表的有志之士,正式开启“无拣择输入”西方学说的进程。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威权一日一日的失坠……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①由此可见,从第一阶段对西方形而下科学知识的大量输入到第二阶段对西方政治、哲学、文论在内的各种形而上知识“无拣择”的输入,均以中国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契机。

梁启超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和欧洲世界的影响,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将欧洲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个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个人主义思潮——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并对19世纪欧洲主要的文学流派和文论学说予以总结,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大约前半期可称为浪漫派(即感想派)全盛时代,后半期可称为自然派(即写实派)全盛时代。”^②他又将欧洲的自然主义流派归为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科学万能梦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揭示自然派的怀疑主义及其科学研究法弊端的同时,宣告了欧洲科学万能梦的破产。最后他还提出了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援救西方文论的理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③

王国维也因有感于鸦片战争、中日海战等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认为新学语的输入是疗治我国文学发展困境的必然之路。他说:“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轰轰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④于时他便以极大努力向中国输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尼采、法国自然主义等文论思想,并写下《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传》《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等著述。

与此同时,外界政治的动荡与转变也导致了中国人心理态势的转变。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④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未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① 清末民初汉语知识界对中国文学发展路径的探索，即是处于这种对西学的崇拜、焦虑乃至臣属和盲从之下。正是在这种危机意识和盲从心态的驱动下，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以极大的热忱向中国输入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又全盘否定中国旧有的文化，甚至期望通过全盘西化以谋求中国诗学的新生。梁启超曾言：“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则以群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② 因此，这种臣属的盲从心态也构成了清末民初西方文论话语大量引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文学发展的内在维度来说，西方文论话语的引入也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关于此点，近代汉语知识界的文论家多有高见，分别从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角度和清末民初文论发展的微观情况予以纵深层次的探讨。就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内在规律而言，王国维曾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概括为“能动→停滞→受动→化合→能动→停滞”这六个阶段。其中先秦诸子各创其学说，并在当时的政治、道德、文学上，俱放其光芒，故可视为最初的“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各家诸子“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③，可视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停滞”时期。自六朝至唐代，随着佛教东适，中国文论界开始进入“受动”期。其言“受动”，主要是因为此时我国固有之文论思想与印度思想尚处于“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④的阶段。直到宋儒将两种思想相互调和，才使我国文论思想由受动进入能动时期，所谓“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⑤。自宋以后直到清末民初，文论思想的发展又与两汉同处于停滞时期。因此，王国维在纵观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基础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③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④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⑤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之上,发出“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①的呐喊。王国维倡导清末民初的汉语界唯有通过外界势力之影响,才能使我国文论思想之发展,由停滞时期重新过渡到能动时代。这里所谓的“外界势力”即指西方的文论思想,正所谓“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②。由此可知,清末民初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输入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正如佛教之于中国文论的发展,西方文论也是推动中国文学理论重现生机的重要因素。

梁启超在总述清代文论发展的整体状况时,曾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③之所以如此概述,是因为清代的文论发展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孕育着近现代文论转型所需的精神质素。此种精神质素即是指经世致用的思想。就“经世致用”而言,最早是由清初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所提倡,其具体理论虽在当时已多不适用,但此种精神确属“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清末民初学者在封建儒学所尊崇的汉宋门户之外,获得一种解放和求实。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以为大辱奇威,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④在清代文论所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作用下,清末民初的中国文论正式告别古代,开启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但想要打破旧有的封建壁垒,复兴与发展中国文论,除了要依靠清代文论所固有的“经世致用”思想之外,还需要结合外来西方文论的助力。“于时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致用’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反叛旗矣。此则清学分裂的主要原因。”^⑤由此可知,清末民初对西方文论的吸收也是清末民初中国文论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需要。

二、清末民初西方文论输入的立场、原则、方法

清末民初文论界对西学的输入,不同阶段及不同文论家态度不同。或援西以入中,中体西用;或以西为主,复及欧亚;或倡导中西平等,主张融会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贯通。正是这些差异,造就了中国清末民初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特征和价值取向。而其中最具时代特征和现代意义的,当属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观点,下面即以此二人为例,分析清末民初汉语界对西方文论的输入所采用的立场、原则和方法等。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梁启超针对近世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提出了“淬厉采补而新之”的立场。梁启超将近世汉语界对西方文论输入的态度概括为两大类:“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①前者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不利于我国文学理论的继长增高,不利于恢复我国文学理论话语在世界文论话语中应有的崇高地位;后者只知盲目输入西方的文论知识,却不知咀其华,撷其实,将中西文论融会贯通,同样也不利于中国文论思想的发展。因此,梁启超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②在他看来,西方文论的输入不但不会有害于我国固有文论学术的发展,还会对其产生继长和增高作用,继又以“凡两异性相结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③为喻,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文明结婚之时代,欲同胞“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④。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对西语的输入必须建立在中西文论融会贯通、淬本采无的基础之上,正所谓:“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⑤此“淬厉”即指对中国本土文论固有特质的清晰梳理和深入研究。“增长”即是通过对外语的输入,以补缺中国文论特质中所缺憾的质素,如科学研究、理性分析等。如若不然,则会“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人之奴隶性”^⑥。故在他看来,西方文论话语的引入必须建立在“淬本采无”的基础之上,若放弃本国固有文论而不屑一顾,吾国虽多输入数十百个斯宾塞、赫胥黎、约翰·弥勒,在当时乃至之后的世界学术史上仍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上文中,梁启超提出对西方文论的输入不可在摆脱崇古贱今的同时患上崇洋媚外的奴性,强调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要秉持思想独立的原则。他在

①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

④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

⑤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⑥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清代学术概论》中将中国思想的痼疾概括为“好依傍”和“名实混淆”。这一奴性思想既存在于古代文论中,同样存在于近代对西方文论引入的案例之中,并以康有为为例,称其《大同书》乃融会中外,创获古今,但却自托出自孔子。在其看来,若此等依傍混淆的病根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①。此意指对西方文论的引入须时刻秉持独立自由的精神原则,谨忌动以西学援附中学,落入依傍混淆的窠臼,遮盖了其原有的意义,故其称:“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②由此可知,梁启超在提倡大量输入西方文论话语的同时,又要求坚持思想独立的原则。既不崇古贱今,取西方文论攀附中学,又不藐视本族以西方文论强释中文。期以最大努力呈现西方文论的原有条理,任重道远,故需中国汉语界学人的共同分担始能有所成效。

就输入西方文论话语的方法论而言,梁启超也有卓见。前面谈到输入西方文论话语要保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原则,以免生出学理上好依傍名实混淆的奴性思想,因此,他提倡对西方文论的引入须建立在“淬本采无”的基础之上,发扬中国文论的优秀传统以惠于世界文论,又以西方文论补缺中国文论中未有之质素。具体来说,就是将研究国学的大道一分为二:“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行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③所谓第一条大道,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整理国故”这部分内容。就文论而言,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史学和文献性质相关的内容,如文论专著的校勘考释,及其所载民风民俗的考证等,这些均可用西方文论的科学方法予以重新审视和研究。在他看来,这部分文论资源,“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④。既然仅用中国本土的方法进行研究已经不能再有所发现与创新,那么现在通过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我们便能掌握西方文论中所具有的客观的科学方法,就有希望推动中国文论的继续成长,恢复中国文论旧有之地位,从而缔造出一种新的格局,但这项工作的完成却建立在熟练掌握西方文论的科学方法和具有中国诗学深厚学养的双重要

①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87—88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

④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73页。

求之上。因此很难依靠一人或几人力予以达到,故倡导合汉语界众人之力,以复兴国学为旨归,各人以其性之所好与平素学问修养为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可以开得有点眉目”^①。

关于第二部分“德行的学问”,即中国文论中有关“人生哲学”的内容,乃是本土文论之所长而西方文论所未及。梁启超在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基础之上,指出“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②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主情、意。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论,研究所谓天道,虽于科学创造上有所创发,但离“人生”确远。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文论,宗教虽以主情、意为多,但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观照人生,终究未有所突破。文艺复兴运动,变主情意的宗教为主智。近代的康德所论范畴,过于严谨,终离人生大道很远。再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的文论学说,征考详博,终离人生很远。由此可知,西方文论的发展以主智主义为主,而其主情、意亦未能贴近人生,故欧洲文论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精神粹集在宇宙原理和物质公例等范围,所用的方法也仅供研究人生之外的几种问题。中国先哲的文论思想宿归于人生一途。他以儒家文论为例,称“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为道’为第一位”^③。因此儒家以仁学为中心,强调人与人相通。故我的好恶即是所有人的好恶,而我的精神中包含了人的精神。因此儒家倡导彼我相通,而又能躬行实践。反映在文学理论方面,则强调“体验”的重要性。因这绝非西方文论中的科学研究法所能抵达,需用内省躬行的方法,“要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④。故涉及“人生哲学”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所输入的西方文学,皆可采用中国文论中内省躬行的方法予以研究。发扬中国文论这一优秀素质,以补西方文论所短,为世界文学和文论发展尽一份力。“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⑤。

王国维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既突破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将西方话语视为形而下的器用立场,也不同于以胡适、钱玄同和鲁迅为代表的“以西为主,别求新声”的西化立场。他从叔本华“知力的

①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74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

④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81页。

⑤ 梁启超:《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83页。

贵族主义”和“天才说”立论，称人类在知力面前虽人人平等，乃每人“生而有之”，但知力的高下确有“贵族平民”的阶级之分。且知力层次的阶级划分与社会等级意义上的贵富贫贱相较差距更大。“其相似者，则民万而始有诸侯一，民兆而始有天子一，民京垓而始有天才一耳。”^①因此，知力虽人人皆有，但能解宇宙人生问题的人则世间难求，故主张打破中西学二元对立的壁垒，突破“体用”“主次”等范畴的尊卑界定，与其开展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正所谓：“知力人人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具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②在肯定外来西方话语输入的合理性与倡导中西文论展开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必须建立在与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相生相化”的立场预设下。

王国维在纵观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基础之上，将西洋思想的输入与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相比拟，得出西方文论思想唯有同中国文论相生相化，方能真正保其势力、发挥作用，促使中国文论由自宋朝以来的停滞期进入充满创新活力的受动期。正如“三藏”法书虽已束之高阁，但两宋之说犹存于官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传入之时，中国儒学的“道统”思想未起，因此学者尚未有“入主出奴”的期待视野，故易被引入接受，其说宜行。且中国固有的思想多为“入世”思想而印度佛教思想多为“出世”思想，为我国本土文论思想之未有，故容易受其影响，其说宜盛。但时至近世，中国因政治上的骚动，而疑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所有西学皆为“酿乱之曲蘖”；平民大众因宗教上的嫌隙，而将欧美文论在内所有西语视为“两约之悬谈”。且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又多同为“入世”思想，而非我国古之未有，因此虽被输入，但很难一时为国人所接纳，故其言：“则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③意即西洋文论若想与中国文学界共生长存，那么西语的输入就只能建立在与本土文论两相调和、相化相生的立场之上，否则虽被输入，流行一时，但终会被束之高阁。

王国维在强调中西文论相生相化输入立场的同时，又要求引入西方文论

① 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③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话语还需遵循学术独立的原则,并提出学术争论的实质,仅在真伪之别的辨析,至于国家、民族、宗教之偏见则应被彻底摒弃。正所谓“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①。王国维从当时文论界的实际状况出发,以自然主义文论观在中国的输入为例,指出法国18世纪自然主义经日本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学术界虽一时引得波涛澎湃。但对于自然主义核心内涵的掌握,却处于固懵无知的状态,只是借其枝叶片语以附和其政治上的目的。而就学理层面而论,则未重视其作为文学理论的自身价值,更未与本土文论相生相合、融会贯通以贡献其学术力量,故感叹道:“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②在此,王国维特别指出,对西方文论的引入,当注重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而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摒弃中西文论二元对立的概念,将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能动发展视为旨归;二是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而非只将其视作政治和教育的手段。

至于王国维西语输入的方法论思想,笔者将其概括为“贯串精博”四字。王国维在回顾当时文论界的“中西之争”时,指出今日文论界的弊端不在于中西二学“何者为辅,何者为重”、“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等方面,而在于中国文论家、翻译家自身的学识能力不足。“中国今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③。又言当时学界从事西方文论翻译、研究的国内学者大多资质平平,一则不能融会贯通自身本土的学问传统,二则对西方文论的处理又失之精确翔实,从而导致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与应用长期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因此他说:“其治西学者,不过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④因此他强调从事西学翻译和研究的文论家,应发扬中国传统学术“贯串精博”的治学方法,以挽回学界颓势,避免堕入旧有文脉已然失落而对西语的掌握又失不足的“固陋欺罔”之中。他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指出,辜氏对于《中庸》的翻译或因不深于西方的哲学,故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80—81页。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③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④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11—112页。

虽时见康德的《知识论》和其伦理学思想,但却流于形而上学的空虚之语充塞于此译本中,或因寻一西方的通俗哲学为蓝本,而附会《中庸》中的思想,且多引文学家之言,致使读者不能发现文本的真藏之所在。故在他看来,“由前之说则失之固陋;由后之说,则失之欺罔。固陋与欺罔,其病虽不同,然其不忠于古人则一也”^①。因此特列此例,警惕治西学者,在从事中西语的翻译与介绍时,既要精于西方文论的学说,又要通于中国固有之文学理论知识,做到“贯串精博”,不违原有文本之真意。

三、清末民初西方文论的输入对重建中国文论的镜鉴

前已谈及,清末民初西方文论话语的引入根源,既有来自中国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又有来自外在客观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学者的盲从心态。因此,“西语”的输入成为中国近现代文论转型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代表了当时以西方文论为主流话语的现代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古代批评范式与文论传统的式微。但这种“式微”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论从未参与过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建构而只是一个古董,而是说为了适应中国文论发展的现代需要,其中一部分不适应现当代文化语境和读者视野变迁的旧质被淘汰,另外一些则以隐形渗透和中西化合的方式融入新的文论传统中来。而这正好体现了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所提出的文学史就是读者期待视野不断对象化的文学接受史,是期待视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变化的效果史这一论断。他认为:“能否按其独特的历史性理解和表现这一文学史取决于期待视野能否对象化。”^②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的过程恰是中国现代文论重建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失语既是必然,则中国文论的重建也是当然。“必然”是“势”之所在,“当然”是“理”之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西语输入进程中学者的盲从心态,虽其对当时引入西方文论和破除旧的封建文化体系具有一定的助力作用,但却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如梁启超所言:“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

^①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② 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①“混乱”是指对所引用的西方文论未能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清晰的阐释,“肤浅”即是对西方文论的输入尚停留在单纯的引用而未能将其相化乃至有所创造。梁启超所谈论的这两个问题,从清末民初至今依然延续未改。曹顺庆先生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指出:“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中国传统话语就几乎被遗弃了,人们纷纷操起西方哲学观点、西方文论方法,纷纷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和表述”,“建国后,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79)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在中国文坛上大显身手”^②。这种以西律中的套用使中国诗学缺乏创造力,陷入了一种混乱和肤浅状态,曹顺庆先生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文论的失语症”。他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进一步论述了“文论失语症”的问题,并将其性质定义为一种“文化病态”,称“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③。产生这种文化病态的根源之一就是自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剧烈冲撞下,所引发的民族心态的失衡。“文化病态之一,是偏激心态的泛滥”^④。正是在这种偏激心态的冲击下,导致了全盘西化错误主张的出台及其对中华文化的大破坏。为此,他在《再说“失语症”》中特别强调,这种偏激心态所导致的“文论失语症”中的“失语”一词,实则是指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原则。“笔者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学术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规则,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失学’,或外语不好之类”^⑤。在这种由偏激的盲从心态所导致的“文论失语”和文化破坏的现状下,我们有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需要。

“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的观点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二十多年过去了,讨论仍在继续。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重建中国文论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文论重建的各种路径。以钱中文和朱立元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文论存在两种现实状况: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论存在过于追随西方文论而脱离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某些概念术语、价值取向、批评范式、审美趣味被简单套用到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和话语系统之中。从这两个现实出发,他们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30页。

② 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第216页。

③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第51页。

④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第52页。

⑤ 曹顺庆:《再说“失语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3页。

的现代转换”这一重建方案。朱立元认为这一重建方案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下更大功夫,用现代意识去审视古代文论传统;更主动地整理、发现、选择、阐释、激活和吸纳其中仍有生命力、契合当代精神价值的优秀成分。对古代文论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①。此方案在得到学界拥护热议的同时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和反对。曹顺庆就曾表明他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赞成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为“所谓现代转换的前提是古代文论不行了,古代文论是死去的文论”^②。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文论仍具有活力与生机,可为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其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待古代文论除了要看到“通”的方面,还要看到其“变”的方面。在融汇中西、古今通变的基础上,以其所倡导的“变异学”理论,在中西对照中由“求同”转向“求异”,进而以中国文化与文论为本位实现中国文论的重建。王宁所提出的“世界诗学”的构想,即基于比较诗学和世界文学的研究成果,涵盖不同国别和民族,尤其是“小民族”的文学和文论传统,有助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完善,进而帮助中国文学和文论重返世界文学和文论界的“中心地位”。^③南帆则从中国文论重建的复杂性出发,主张中国文学理论必须加入现代性话语平台,参与各种对话与竞争,从而在多重视角乃至不同观念的挑战中构思新型话语体系,摆脱西方理论模式完成民族自我叙事。^④高建平提出应从当下文学实践出发建立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思路。^⑤如此等等。

以上诸种关于中国文论重建的方案,均有其合理之处,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考察。本位主义者倡导以中国文论与文化为本位,致力于追溯中国古代文论,挖掘其文化资源以重塑当今中国文论的话语模式。但此方案如果过于强调中国文论话语的纯粹性,则会将中国文论的研究变为故纸堆中的学问,丧失其生机与活力。转换主义者倡导加入现代话语平台、注重当下文论实践,更乐于在现有文论模式的基础上接受多种对话方式,从多重视角和挑战观念中实现文论模式的重建。但此方案如果默认西方话语在现当代中国文论中的主体地位并进而完善这一理论,纯以西方抽象、思辨、系统等文论传统为参照来评价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那么,这本身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种集中

① 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58页。

② 曹顺庆、刘衍群:《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0页。

③ 参王宁:《世界诗学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④ 参南帆:《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环境与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⑤ 参高建平:《从当下实践出发建立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体现。因此,无论是强调中华文化本位以构建中国文论,还是承认现实倡导平等对话,首先必须摒除关于中西文论“体用”“主次”的尊卑界定,突破中西文论二元对立的壁垒,真正从清末民初所形成的盲从心态中解脱出来,重拾文化自信。以此,清末民初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先觉之士面对西语的输入所提供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对于今日中国文论的重建和疗治“文论失语症”亦具有可供借鉴的方面。

就梁启超所采用的“淬本采无”的主要立场和“独立自由”的思想原则而言,其倡导中国文论系统的重建应以尊重中国本土文化,保持文化自信为前提。在吸取西方文论所擅长的逻辑思辨和科学考证的同时,淬厉中国文论特别是“人生哲学”方面“内省体验”的优秀传统,并将二者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文论系统,以有惠于世界文明。具体来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①。习近平总书记说:“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要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③。这既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也与梁启超的认识异代同响。在笔者看来,梁启超对中国文论重建的构想,在尊重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以中西文论两相化合和积极对外扩充的方式,既可克服“转换主义者”和“本位主义者”对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未能统一的矛盾,又可打破中西文论二元对立的壁垒,使其在保持和恢复“文化自信”的同时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互释互补。

再就王国维“双生双化”“贯串精博”一线的输入观而言,其倡导中国文论的建设,一要实现中西诗学的融会贯通、相互化合,继以带动中国文学理论的能动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变。二要秉持中国古代学术的优秀传统,以“贯串博学”的精神从事中西学的介绍和研究。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曾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又说,“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

①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94页。

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①。王国维要求在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前提下，不断吸收外来文论的优秀成分，使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相通、相生相化，进而激活中国本土文论生命力。笔者认为，这一构想不仅突破了中西“体用”“本末”的尊卑设定，又将新的文论系统置于一种多重对话、交叉视角的现代性平台之下。此举对内可惠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继长与增高，对外有利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融汇共存以及中国文化价值的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项‘形于中’而‘发于外’的重大战略任务”^②。时至今日，王国维“双生双化”“贯串精博”的文论观，若用于重建中国文论，对提高国家软实力、恢复文学自信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李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蕊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见徐洪兴编，《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08页。